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

引子

1936年12月12日凌晨4时许，古城西安，寒气袭人。座落在市区南部的千年宝塔——大雁塔正准备拂去一夜灰尘，抖擞精神，迎接又一个黎明。突然，一阵激烈的枪声划破寂静的夜空，惊醒了睡梦中的人们。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率部活捉了蒋介石和十多名国民党军政要员，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

为什么会发生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捉住了蒋介石为什么又放了他？中国共产党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做了哪些努力？张、杨在事变后的命运如何？为什么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时局转换的枢纽？

本书将通过叙述西安事变前后的一些概况回答这些问题。

一、危难之秋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这是一首凄凉、悲壮的歌。每当我们听到它，思绪就会随着那低沉、幽婉的旋律追回到 60 年前。

1931 年 9 月 18 日夜，喧嚣了一天的东北大城市沈阳已经逐渐沉静下来，马达结束了轰鸣，车轮停止了转动。10 时 20 分，日本关东军按照预定的计划，由独立守备队岛本大队川岛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在柳条湖村附近，把骑兵用的小型炸药装置在铁轨一侧，炸断了一小段铁轨和枕木。河本反诬沈阳北大营中国驻军破坏南满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川岛中队长立即率兵向驻守沈阳的张学良部发动进攻，炮击北大营及其他军事设施。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制造了一系列武装挑衅事件，侵犯中国东北的企图昭然若揭。但蒋介石却令国民党东北驻军，“遇有日军寻衅，务须慎重，避免冲突”。九一八事变当晚，驻军北平（今北京）的张学良向南京政府电告情况，并请示可否还击，正忙于指挥对红军进行第三次军事“围剿”的蒋介石急电指示张学良：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要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即使日军“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在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下，数十万国民党军队没放一枪一炮，乖乖地退出了阵地。

一夜之间，东北重镇沈阳落入侵略者手中，张学良官邸 3200 万银元的黄金和 8000 万库银被劫掠一空，沈阳兵工厂、迫击炮厂、火药厂等中国第一流的军工企业被关东军全部据有，张学良部的 262 架飞机、3091 门火炮、26 辆战车、11.82 万支步枪手枪和 5864 挺机枪也成为日军的“战利品”，官方财产损失达 17 亿之巨。

不到一个星期，日本侵略者先后侵占了辽宁、吉林两省的三十多个城市。

仅仅四个多月，东北三省全部沦陷。二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富饶土地在侵略者的铁蹄下悲怆呻吟，三千万苦难同胞在关东军的魔爪下痛苦挣扎。

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的灾难。

然而，野心勃勃的日本帝国主义并不以侵占中国东北为满足。20 世纪 20 年代，日本就已形成了侵占中国东北，征服中国，称霸世界的所谓“大陆政策”。因此在占领我国东北后，日本帝国主义继续扩大侵略，1932 年 1 月 28 日，对上海发动突然袭击。驻扎上海的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的指挥下，英勇抵抗，坚持战斗一个多月，打死打伤日军一万余人，迫使日军三易统帅。蒋介石却下令撤退。十九路军在后无援兵，手无弹粮的情况下，被迫撤离。蒋介石派代表国民政府外交次长郭泰祺与日本代表重光葵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允许日本在上海驻军，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南市、浦东。

1932 年 3 月 9 日，日本策动在东北正式建立伪“满洲国”，早已被废弃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粉墨登场，出任“执政”，1934 年 3 月 2 日称帝。

1933 年 1 月 3 日，华北战略要地山海关失陷。此后，日军相继占领承德、

长城各口、多伦、张北、商都等地，重兵逼临平津，华北受到严重威胁。

1933年5月31日，蒋介石同日本签订《塘沽协定》，承认日本占领我东北三省和热河省（今湖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内蒙东南部），把河北省东部划为“非武装区”，日本人可以自由出入。至此，华北门户洞开。

1935年，日军又向华北地区发动了新的进攻。5月，向南京政府提出对华北统治权的无理要求，从东北调兵入关，以武力相威胁。6月初，南京政府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开始同日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秘密会商。7月6日，何应钦正式函复梅津美治郎，接受日方要求，即所谓的《何梅协定》。6月20日，南京政府察哈尔省（今河北省西北部及内蒙锡林郭勒盟）代理主席秦德纯与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以换文方式签订《秦土协定》。这两项协定使中国在冀、察两省的主权大部分丧失，部分军队撤出华北，国民党河北省党部、北平市党部、天津市党部撤离平津，河北省政府由天津迁往保定。接着，日本侵略者又策动了河北、察哈尔、绥远（今内蒙古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呼和浩特市、包头市等地）山西、山东等省的所谓华北五省的“自治运动”。11月25日，汉奸殷汝耕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声明冀东22县脱离国民政府。12月18日，国民党为适应日本“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指派宋哲元等人组成“冀察政务委员会”。1936年5月12日蒙奸德穆楚克栋鲁普组织伪“内蒙自治军政府”。整个华北面临着成为第二个东北，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危险。平津危急！华北危急！！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中国共产党高举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大旗，组织和领导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斗争。1931年9月20日，即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中国共产党就发表宣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揭露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此后，中共中央又多次发表声明、宣言，号召人民武装起来，“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1935年8月1日，中国工农红军正在长征途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政府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指出：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呼吁各党各派、各军队、各界同胞应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在白山黑水之间，杨靖宇、赵尚志等领导东北抗日义勇军顽强抗击着日本侵略者，用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赞歌。在上海，数十万工人举行反日大罢工；1936年6月1日，宋庆龄、邹韬奋、沈钧儒等领导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宣告成立；在北平，1935年12月9日，青年学生示威游行，要求南京政府公开对日交涉的经过；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保障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爆发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

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全国人民的救亡行动相反，在国难日深的形势下，蒋介石仍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调集百万大军“围剿”中央红军。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以后，又派重兵围追堵截。与此同时，还千方百计镇压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11月23日，逮捕了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制造了轰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

日本侵略者的步步进逼，蒋介石的妥协退让政策，使中国亡国之祸，迫在眉睫。中华民族真是到了最危急的时刻。

二、“少帅”张学良

1932年3月初的北平，春寒料峭，一阵冷风吹来，街上的行人不禁又裹紧了身上的衣服。西城北沟沿顺承王府内，三十几个人围坐在几张桌子旁，正侃侃而谈。桌上早已经摆好了美酒、冷盘。12时，1时，1时30分……仍不见宴会主人的身影。饥肠辘辘的客人们低声议论起来，“请帖上不是写的12时午餐吗？”“是呀，不知为什么……”当时针指向下午2时时，宴会厅里走进来一位面色苍白，形容清瘦，衣冠不整，甚至连领带都系歪了的人，他就是今天宴会的主人，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原南京政府陆海空军副司令，人称“少帅”的张学良。张学良在这里摆宴席，是为归国抗敌的留学生接见洗尘。虽然，赴宴者对张学良深染嗜毒恶疾已有耳闻，但见到他那副颓靡潦倒的样子，仍不免大吃一惊。熟悉他的人还清晰记得，多年前的张学良可是红光满面，英姿勃勃。

张学良，字汉卿，辽宁海城人，生于1901年，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长子（兄弟姐妹共7人）。张作霖土匪出身，从一个“保险队”的头目，逐步成为执掌东北政治、军事、经济大权的“东北王”。在1920年的直皖战争中，张作霖助皖反直，皖系失败，段祺瑞通电下野，直奉两系共同控制北京中央政权。张作霖在北京设奉军司令部，除任东三省巡阅使外，又兼任蒙疆经略使，节制热河，察哈尔和绥远，从“东北王”一跃而为“满蒙王”。1921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张作霖兵败出关，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宣布东北“联省自治”。1924年，直奉战事再起，张作霖以战胜者的身份执掌北京中央政权，自称陆海军大元帅，人称“张大帅”。1928年，蒋介石联合冯玉祥、阎锡山等进攻奉系军阀，奉军节节败退，大势已去。日本企图乘张作霖兵败之际完全控制东北，但张作霖不甘心作日本的傀儡，奉日矛盾日趋激化。1928年6月4日凌晨5时27分，在张作霖专列行至沈阳附近的皇姑屯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先埋置的电控炸药炸毁。张作霖身受重伤，运回沈阳后死去。

也许是张家长子的缘故，张学良从青年时代起就参与军机，统领军队。1919年，进东北陆军讲武学堂第一期学习炮兵，毕业后被授予炮兵上校衔。此后，步步擢升。1926年，已是陆军中校的张学良任安国军第三军团长，进兵河南，次年被北伐军击败，屯兵保定。张学良在京汉线上指挥奉军撤退的过程中得知其父被炸的消息后，强忍悲痛，沉着镇定，指挥军队顺利撤入京奉线。6月19日，张学良化装成士兵乘坐铁闷罐车秘密返回沈阳，承袭父职，于7月2日出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成为东北的最高统治者。

张学良主持东北政局后，面临的形势十分险峻。一时间，少帅府说客不断。日本派专使林权助以吊丧为名来到沈阳，胁迫张学良“独立”。蒋介石派方本仁北上，劝张学良把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换成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也来到沈阳，助蒋活动，劝张“易帜”。张学良思忖再三，权衡利弊，决心不顾日本侵略者的威逼利诱，以国家统一为重，毅然于12月9日通电全国：“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当天，南京政府的青天白日旗飘扬东北。31日，南京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官，蒋介石政权也暂时获得了形式上的统一。

1930年，中原大地，硝烟弥漫，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百万大军，铁马金戈，互相厮杀，一时胜负难决。此时，张学良手握重兵，其向背对参战者的命运至关重要。各方代表云集求见，巧舌如簧，竭力争取张学良站在自

己一边。9月18日，张学良发表通电，表示站在蒋介石一边。接着派兵入关，大军所到，势如破竹，使阎冯势力迅速瓦解。10月9日，张学良接受蒋介石的任命，就任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11月，又受蒋介石邀请到南京参加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他虽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但因为蒋介石立下盖世奇功，而有此“殊荣”。张学良乘坐蒋介石派的专列进京，津浦沿线的车站上，到处悬挂着大标语：“欢迎促进统一、竭诚拥护中央、劳苦功高的张副司令！”他到南京时，受到了隆重的欢迎，从车站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大院，一路上彩旗飞舞，锣鼓喧天，警车开道，众人簇拥。年仅30岁的张学良成了人们恭维、赞颂的“英雄”，心中好不得意。

然而，一年以后，又是“9·18”，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把东北军全部撤退到关内，致使东北沦陷，遭到全国人民的责难，从此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恶名。1933年3月，热河失陷后，全国舆论哗然。蒋介石转嫁罪责，迫使张学良引咎辞职，却又假惺惺地对他说：“汉卿，我与你同乘一舟，行将倾覆，若不先有一人下水，平息全国愤怒浪潮，难免同遭灭顶。因此，我决定同意你的辞职，待机会再起。”张学良含辱忍耻，代蒋受过，胸中有难言之痛，老父血肉模糊的惨景又浮现在眼前，国恨家仇一齐涌上心头，却又恨难雪，仇难报，心情十分沉重，不禁失声大哭。

1933年4月11日，张学良携夫人于凤至、赵一荻小姐和一批随行人员乘“罗西伯爵”号轮船去意大利考察。出国前，他以极大的毅力和坚强的意志，在德国医生密勒的精心指导下，在于凤至、赵四小姐的周到服侍下，戒除了多年的吸食毒品的恶好。此后的张学良如同换了个人一样，又恢复了当年少帅的英姿。

1933年底，蒋介石为利用东北军“剿共”，电召张学良回国。次年1月8日，张学良回到上海，被任命为“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的副总司令。从此，东山再起的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被蒋介石推上与红军作战的道路。然而，他的内心是痛苦的。他曾对人说，“国人骂我不抵抗，我现在很希望领袖不叫我剿共，叫我抗日。我觉得剿共牺牲不如抗日牺牲更有价值。”在武昌期间，张学良曾邀请流落武汉的东北同乡，在武昌明月桥畔聚会。他请到会者每人喝一杯又苦又涩的黄连水，要大家卧薪尝胆，不忘国耻。

1935年，红军长征进入陕北，蒋介石便撤消了鄂豫皖“剿总”，改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蒋自兼总司令，张学良仍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于是，张学良又率领近二十万东北军来到陕甘。

11月，张学良赴南京出席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与五年前隆重热烈的场面形成鲜明的对比，到机场接他的仅仅是一个小小的侍从室主任，冷冷清清，凄凄凉凉。张学良明白，受到冷落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和共产党军队作战吃了败仗。想起五年来的经历，心中就像打翻了五味瓶，苦甜酸辣咸，什么滋味都有，令他感慨万千。就在他还没理出个头绪来的时候，一天傍晚，副官把一份电报送到了他手上，只见上面写道：“11月24日，我军109师全部、106师部分，被匪军歼灭于富县直罗镇地区，109师师长牛元峰以身殉职……”犹如五雷轰顶，这封电报令张学良目瞪口呆，半晌没说出话来。这已是他赴西安上任后，东北军吃的第三个败仗了：10月1日，110师被红15军团歼灭于甘泉县的劳山，师长何立中阵亡；25日，红15军团又袭击甘泉以南榆林桥的107师619团，歼灭四个营，团长高福源被俘。

张学良是个精明人，接连的失利使他不得不面对自己的对手，这是一支

不可轻视的力量。他开始为东北军的前途和出路而忧虑：这样和红军打下去，打回老家去的梦想还能成为现实吗？这时，一二九运动爆发，南京的青年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吼声就响在张学良的身边。在全国人民抗日浪潮的推动下，张学良也想尽快从内战的泥潭中拔出脚来，把枪口对准侵略者。但是，出路在哪里呢？困惑中的他想起了老朋友杜重远。

杜重远是吉林怀德人，早年留学日本，曾任奉天省（今辽宁省）总商会副会长。九一八事变后到北平，与阎宝航等人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一面进行抗日宣传，一面声援东北抗日义勇军。不久又到上海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并创办《新生周刊》。该杂志因刊登《闲话皇帝》一文，被日本驻沪总领事认为是污辱了日本天皇。杜重远因此被判处徒刑一年零二个月。

张学良在南京开完会后，秘密到上海会晤了仍在狱中的杜重远。杜重远诚恳地批评了张学良过去的错误，建议他联合红军抗日，并指出，杨虎城有抗日进步思想，身边又有一批爱国之士，可以与他合作，以形成西北大联合，共同抗日的局面。杜重远的一席话，使张学良受到很大启发。此后，他又找了从苏联回国的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希望李杜能帮助他沟通与苏联的关系，并郑重请李杜替他介绍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相机进行商谈。

在上海的最后一天，张学良又专程拜访了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女士。宋庆龄在听了他的倾诉后，热情鼓励他要振作精神，用积极抗日的实际行动来改变“不抵抗将军”的形象。

张学良的此次上海之行，使他那长期郁闷的心中透进了一缕曙光。他已理清了自己的思路，那就是停止内战，联合共产党，一致抗日，但是，怎样才能与共产党取得联系呢？

三、“虎将”杨虎城

1935年11月的南京，虽然刚刚立冬，但严冬的寒意已笼罩了这座扬子江南岸的古城。人行道两旁的法国梧桐，早已秋风落叶，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枝，在风中无力地摇晃。首都饭店的一间客房里，参加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张学良正在为109师兵败直罗镇而双眉紧锁，坐立不安。一阵敲门声打断了他的思路，进来的是一位典型的关中大汉，只见他魁梧的身躯，黑红的脸膛上，两道浓眉透着倔强不屈的性格。他就是南京政府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

杨虎城也是从西安来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全大会的，但他没有住在代表们下榻的首都饭店，而是住在十七路军驻京办事处。今天他是专门来拜访张学良的。俩人的部队都驻扎在陕西，被称为西北“两只虎”，但东北军没入陕之前，杨虎城是陕西省的最高军事长官，自“西北剿总”成立后，他就要受张学良的节制了。从外表上看，他俩都是一副标准的军人风范，但性格却有很大的不同。张学良英姿勃勃，年轻气盛，杨虎城则使人感到深谋远虑，沉着稳健。与张学良子承父业、青云直上不同，杨虎城今天的地位，全靠自己二十多年在腥风血雨的搏杀中，一刀一枪打出来的。

杨虎城，又名虎臣，陕西蒲城人，1893年11月生。自幼家境贫寒，只念过两年私塾，童年时就到一家小饭馆当徒工，烧火打杂。1908年，父亲杨怀福遭仇家陷害，被清政府绞死在西安，这在他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创痛。父亲的惨死，使这贫苦的家庭如同雪上加霜，一家人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15岁的小虎臣，上有老母，下有幼弟，债务累累，生计无着，使他对清政府的仇恨逐渐加深。不久，他和当地一些年轻人成立了“中秋会”，打富济贫，扶弱抑强，会员很快发展到一百多人。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杨虎城率领中秋会部分成员参加了陕西反清革命队伍，多次在乾县、永寿一带与清军作战，击败清军，后因不满队伍内部的腐败现象而退伍还乡。蒲城东南乡有一个大恶霸李桢，勾约官府，仗势欺人，强占民女，作恶多端。老百姓恨得咬牙切齿。1914年，杨虎城集合一批人，打死了李桢，为东南乡百姓除了一大害，受到贫苦农民的称赞，却也因此遭到官府的通缉。杨虎城被迫走上了“刀客”（陕西江湖人物的一种）道路，浪迹天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1915年，袁世凯称帝，杨虎城率众参加陕西护国军，在朝邑、华阴一带与袁军作战，武装力量不断壮大。这次军事行动结束后，他被委任为陕西陆军第3混成团第1营营长。在此后的“护法”之役中，他拥护孙中山的主张，转战关中，功绩累累，名扬三秦。陕西靖国军被直系军阀分化瓦解后，杨虎城拒绝收编，“保全革命人格”，坚持“靖国军”旗帜。后转战千里，退驻陕北。

到陕北之后，杨虎城一面整训部队，一面派人与孙中山联系。1924年1月，孙中山通过杨的代表，批准他为国民党党员。在追随孙中山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他历尽沧桑，几遭磨难，却始终未能如愿。此时又身患重病，心情更加愁闷。就在这时，著名教育家，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为杨虎城介绍了中共陕西地区党组织创始人之一魏野畴（公开身份是榆林中学教员），两人一见如故，多次彻夜长谈。魏野畴向他分析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宣传共产党的纲领、主张。魏野畴的话，犹如一泓清泉流入龟裂的土地，使杨虎

城的心中又升腾起希望的力量。

驻军陕北，是杨虎城一生中至关重要的时期。他在这里受到了进步思想的熏陶，对以后的思想转变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在杜斌丞、魏野畴的建议帮助下，他在自己的部队中成立了教导队，聘请了几位军事专家，如赵青山、段象武等，还招收了一批青年学生，如张汉民、孔从周、刘威诚等。这些人以后在杨虎城部都担任重要职务，有的还参加了共产党。可以说，这个时期，为他以后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事奠定了基础。

1926年1月，广东革命政府正在筹划北伐，直系军阀吴佩孚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对国民军开战，派刘镇华率领土匪集团镇嵩军号称10万之众进攻陕西。刘镇华率部长驱直入，兵临西安城下。西安城内守军只有李云龙所属国民军第2军第10师等部，兵力不足5000人，西安告急。这时，杨虎城急速率领国民军第3军第3师从三原开进西安，与李云龙部共同守城。这就是人们所称的“二虎把长安”（李云龙又名李虎臣）。

“二虎”的部队加起来不过万人，被十万敌军团团围在西安城内，敌众我寡，消息不通，弹药消耗得不到补充，后期粮草断绝。一些人悲观失望，提出言和投降。杨虎城斩钉截铁地说：“虽留我一人，也非死守不可！有倡言和者，即以军法从事！”他们就是在这极为艰难条件下，顽强抵抗，坚守8个月。终于依靠进步力量的配合，在冯玉祥率领的国民联军的支援下，于11月28日解围。这次守城之役虽然付出了重大代价，但牵制了吴佩孚的一部分军事力量，在战略上有力地策应了北伐战争。这是杨虎城前半生戎马生涯中最光辉的一页。冯玉祥进入西安后，即晋升他为国民联军第10路总司令。随后，杨虎城率部东出潼关，参加北伐战争，与国民革命军会师中原。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把枪口对准了曾与之并肩作战的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烈士的鲜血染红了黄浦江。不久，冯玉祥也与蒋介石合流反共，使西北地区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正当全国掀起反共恶浪之际，杨虎城不仅没有执行“清党”命令，与共产党的关系却日趋密切，任命共产党员蒋听松为军部秘书长，魏野畴为军部政治部主任，南汉宸为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校长。在他的部队中，共产党组织发展到二百多人。由于叛徒向国民党交出了共产党员名单，蒋介石下令逼迫杨虎城逮捕南汉宸等共产党员。杨虎城毅然抗命不遵，仍然我行我素，不但没有逮捕共产党员，而且给他们发放路费，礼送出境。他对部下17师师长孙蔚如说：“这些朋友都是我们请来的，纵一时不能合作，也要对得起朋友，要有道义，要留有他日见面的余地。”他还对南汉宸说：“我宁愿丢开我的军队，也不能把同你们的关系搞坏。”

1929年4月，蒋介石、冯玉祥的关系极度紧张，濒于破裂。杨虎城权衡利害，率部投归了蒋介石。在以后的新军阀混战中，他助蒋作战有功，部队得以扩大，当了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兼陕西省主席，并一度进军甘肃，成为西北地方实力派的首领。这个时候，杨虎城有统一整个西北的雄心。但他不是蒋的嫡系，蒋介石不信任他，既使委以要职时，也对他多方限制、削弱，派顾祝同为潼关行营主任，率部进驻潼关、华阴等地，以扼制陕东咽喉；后又派嫡系胡宗南部驻扎天水，以控制整个西北。1933年5月，蒋介石以突然袭击的方式，以邵力子取代杨虎城，出任陕西省主席。这对杨虎城来说，是无法忍受的奇耻大辱。1934年10月，蒋介石把杨部17师49旅改编为新5师，开出陕西，脱离杨的管辖。这一切都使蒋、杨间裂痕愈来愈深。

九一八事变后，具有强烈爱国思想的杨虎城，不赞成蒋介石“攘外必先

安内”的政策。他曾亲自到石家庄面见蒋介石，请缨抗日，遭到拒绝。但他并没有放弃初衷，回陕后，他对部下说，“国家民族不抗战，没有出路，我们十七路军也没有出路”。于是，他办起了步兵训练班，进行以抗日为主的教育，教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歌曲。1933年5月，共产党员吉鸿昌与冯玉祥合作在张家口揭起抗日同盟军的旗帜。他立即通电拥护，并为抗日同盟军提供武器弹药。1934年“九一八”三周年之际，杨虎城在西安绥靖公署操场上阅兵，公署大门的横幅是：“摒绝一切内战，统一意志，以图救亡”。

杨虎城虽然对蒋介石十分失望，但当徐海东领导的红军25军于1934年底进入陕南，蒋介石严令他堵截时，他不得不动调直属警备部队3个旅去与红25军周旋。他曾对部署说：“蒋调我出去打红军，咱还可以用各种借口不出去，现在红军进入陕西，就很难应付了。”结果不到半年时间，两个旅长被杀，一个负伤，使他的总兵力损失了四分之一，遭到蒋介石的训斥和讥讽。杨虎城陷入了和战两难、一筹莫展的境地。

这种困难处境，使杨虎城表面上表现得很消极。但为了掩饰对蒋介石的不满，以减少蒋对他的猜疑和压力，他曾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花销8万元大洋收买选票，当上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因此，当张学良向他道贺时，他只能以无可奈何的苦笑算作回答。为了向蒋介石暗示他已无政治欲望，在人称天堂的杭州盖了房子，要做西湖寓公。但这一切都并非是杨虎城的本意，只是不得已而为之。杨虎城是一个进取心很强的人，只要还有希望，他就不会放弃努力，不会以西湖寓公的生活打发余生。

四、三位一体

1936年1月中旬的一个傍晚，张学良从“剿总”办公地点回到金家巷公馆，脱下军装，换上便服，刚接过赵四小姐递过来的热毛巾，就听得门口传来一声“报告！”“进来”，张学良边擦脸边说。

“报告副司令，王军长急电”。机要参谋把译好的电文交给张学良。电报是驻军洛川的67军军长王以哲打来的，只见上面写道：“被红军俘去的高福源团长，现被红军派回，据云有机密要事，要求向副司令面陈。”阅罢电报，张学良的心中似倒海翻江，他没有想到高福源还活着，更没有想到会被红军放回来，也想象不到会有什么机密要事。张学良立即自己驾驶着波音飞机前往洛川，接见这位突如其来的“俘虏使者”。

高福源被俘后，红军不仅没有杀他，还给他认真换药，医治枪伤，派专人向他介绍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在瓦窑堡的两个月生活，使这位性格耿直的东北军军官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向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主动提出，回去说服东北军和张学良与红军联合抗日。他的要求得到了批准。

张学良到了洛川王以哲军部后，连茶也没喝一口，就吩咐把高福源带来。高福源虽是一身陕北农民的打扮，羊肚白毛巾，黑衣黑裤，还是立正向张学良行了个标准的军礼，“报告副司令，我回来了。我这次回来是红军让我回来的，有许多情况要向副司令报告。”

张学良右手猛地往桌子上一拍，大声喝道：“你好大的胆子，打了败仗，当了俘虏，还有什么脸面回来见我！我枪毙了你！”

高福源毫不示弱，慷慨陈词：“副司令，你要杀我，就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那太容易了。但你不要忘了，我们东北三千万同胞当了亡国奴，不要忘了先大帅是怎么死的。现在人家共产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诚心诚意要帮助我们东北军打回老家去。你有什么理由拒绝人家的好意，有什么理由骂人家是‘匪’。副司令，再继续打内战，我们东北军就要被消灭完了。”高福源越说越激动，不禁泪如泉涌、失声痛哭。张学良也流下了滚烫的泪珠，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双手搂住高福源的肩膀，激动地说：“你说得对，你说得对，刚才我是想试试你的胆量。不错，你是好样的。”

高福源擦了擦泪水，把他在瓦窑堡的所见所闻向张学良做了详细汇报。最后，他说道：“如果副司令愿意同共产党合作，他们可以派正式代表来和我们进行谈判。”听到这里，张学良立即对高福源说：“你休息两天赶快回去，请红军派一位正式代表来，我们正式商谈一下。你就放心去做这个工作，万一出什么危险，你家属的生活和子女的教育，都由我和王军长负责。”

高福源回到瓦窑堡后，叙述了他和张学良见面的经过，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亲切接见和热情鼓励。中共中央决定派李克农为代表与张学良会谈。

3月4日，刚从南京回来的张学良驾机前往洛川，与李克农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会谈，并达成了三项口头协议：（一）为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中共派一位全权代表，最好毛泽东或周恩来，与张再次商谈；（二）红军代表经新疆去苏联，由张负责和盛世才交涉通道问题。（三）中共派一位联络代表常驻西安。

离开洛川后，李克农向毛泽东汇报了情况。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副主

席于4月8日前往肤施（今延安）与张学良会谈。

4月8日上午，周恩来、李克农和随行人员按预定时间赶到延安城东北的川口村。但由于这天风雪交加，加上双方联络失时，张学良没能按时到达。第二天下午，天晴云散，张学良的专机才在延河边的一个简易机场降落。下了飞机以后，张学良与同行的王以哲等急速向会谈预定地点、城内的天主教堂走去。

周恩来与张学良作了彻夜长谈。张学良完全同意关于“停战合作，一致抗日”的总方针。他说：“我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周恩来说：“我们也是这样”。张学良特别向周恩来提出，抗日统一战线应包括蒋介石，并详细谈了他的看法。周恩来表示要认真考虑这个意见（中共中央接受了张学良意见，并考虑其他因素将反蒋抗日方针改为通蒋抗日方针）。双方还就停止内战，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红军北上抗日，经济通商，互派代表，进行抗日教育等问题达成了一致。

这次会谈的气氛是热烈、友好、愉快的。会谈结束时，张学良、周恩来“共誓永不毁约”，张学良把一本中国地图赠送给周恩来，说“共同保卫中国”，还赠送私款2万元银洋（后又赠送20万法币），并招待周恩来一行吃了一顿丰盛的夜餐。周恩来一行离开延安时，已天色大明。

延安会谈，在张学良坎坷不平的戎马生涯中掀开了新的一页，他终于找到了抗日救国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在争取张学良共同抗日之时，也没有忘记长期与共产党合作的杨虎城，加强了同杨虎城的联系。

1935年12月，在陕西长武县北乡杨公镇附近，急匆匆走着一位讨帐先生模样的中年人，头戴一顶毡帽，身穿一件阴丹士林布的长袍，腰系蓝色布带，肩上背着的褡裢里，一头装着算盘，一头装着帐簿。突然，两个地方民团挡住了去路，上来就动手搜查，从头到脚，又从脚到头，搜了两遍，终于从长袍夹缝中搜出两封信。可他们在信封上看到杨虎城、杜斌丞的名字，便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不知如何是好。

这位“讨帐先生”就是红26军政委汪锋，他是奉中共中央之命，前往西安争取杨虎城联合抗日。临行前，毛泽东接见了汪锋。毛泽东一边打着手势，一边用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对汪锋说，“只要争取了十七路军和东北军，就可以实现西北大联合；只有实现西北大联合，才可能有全国的抗日大联合。”停了一下，他又接着说：“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但也有一定的危险；谈判不要决裂，要谈和。”

汪锋在西安期间，三次会见杨虎城。但因杨虎城不了解红军的困难，看到毛泽东、彭德怀用的信纸很粗糙，认为中共大人物不应如此草率，便怀疑是蒋介石派人持假信来侦察他的。所以，杨虎城、汪锋的会谈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结果。

1936年2月，中共北方局负责人之一王世英来到西安。杨虎城在止园别馆秘密会见了她。双方经过交谈，达成口头协议：（一）红军愿与十七路军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二）双方可以互派代表；（三）十七路军建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输物资和掩护人员往来；（四）双方同时做抗日准备工作。4月底，王世英再次来到西安，告诉杨虎城，中共中央已同意他们所达成的口头协议，同时说明汪锋是毛泽东所派的。杨虎城表示对协议原则同意。从此，十七路军与红军基本停战，但协议的其

他各项尚未实施。8月下旬，中共中央又派毛泽东的秘书张文彬为代表，继续与杨虎城谈判。9月7日，双方就合作抗日实施办法，达成三条口头协议：（一）互不侵犯；（二）取消经济封锁；（三）建立军事联络。这次会谈确定了红军与十七路军的联合。

在红军分别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实现联合后，剩下的就是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之间的联合问题了。最初，张学良与杨虎城只限于官场应酬来往，双方见面，寒暄客气，并无深交。但二人都有与对方搞好关系的愿望，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试探，相互之间情谊日增，戒备日减。双方还各自派人组成联席会议，不定期举行。由于联席会议的沟通，张、杨之间商谈的问题日渐深入，可以深谈停止内战和抗日等问题了。1936年6月，广东、广西发生反蒋事变，张、杨经过反复商量，决定分别致电蒋介石，反对对两广用兵，要求和平解决事变，实现国内统一，共商抗日大计。如果蒋介石对两广用兵，即出兵援助两广。为避免引起蒋介石的猜忌，两封电报的措词不同。

对“两广事变”的态度，表明张学良、杨虎城已联合一致。这样就形成了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三方面联合抗日的统一战线。三方之间，互相信任，通力合作，为团结抗日共同奋斗。人们把这种局面称为“三位一体”。三位一体的抗日阵线，在西北大地迅速发展，正以倒海翻江之势掀起扭转乾坤的狂澜。

五、暴风雪前夜

1936年12月4日下午，天色阴沉，古城西安在呼啸的寒风中打着冷战。往常人群川流不息、熙来攘往的西安火车站，突然戒备森严，荷枪实弹的军警布满了站前广场。3点钟，随着一声汽笛的长鸣，一列专车徐徐开进火车站。从车上走下来的是全副戎装的蒋介石。蒋介石的脸色没有一丝笑意，他向欢迎的人们轻轻点了点头，便坐上汽车直奔临潼华清池。

这已是蒋介石一年当中第二次来西安了。在日本帝国主义步步加紧侵略，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的形势下，蒋介石仍然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平息了“两广事变”后，又腾出手来，继续他的“剿共大业”。10月22日，蒋介石曾飞抵西安，停留了一个星期，动员张学良、杨虎城在“剿共”中为他打头阵。蒋介石离开西安后，张学良曾两次飞赴洛阳，面见蒋介石，请缨抗敌。蒋介石却对张学良说：“你的责任就是剿共，不许到绥远抗战，若要不然，就把你换掉。”这一回蒋介石再一次进驻西安，是准备大打一场内战的。他已经把军事机器开动起来，正在向河南集结重兵，在随他来西安的军界要员中，就有蒋鼎文、卫立煌、朱绍良、陈继承、陈诚、万耀煌、陈调元等人。此时的西安，真可谓星将云集。十足的火药味充斥了整个城市。

蒋介石住进华清池以后，张学良每天都要去一次，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陈述东北军官兵普遍希望抗日，不愿打内战。蒋介石当然不同意张学良的请求，企图以种种理由说服他，而且还常常训斥他。

12月7日晚上，张学良又来到华清池，准备对蒋作最后劝谏。当他跨进蒋介石的住所五间厅时，蒋介石手里捧着线装的《曾文正公全集》，正在聚精会神地阅读。见到张学良，他脸上露出不耐烦的神色。张学良看了蒋介石一眼，开始了他的长篇陈述：“日寇侵略我国，贪得无厌，步步紧逼，继东北沦陷之后，华北已名存实亡。最近，日伪军又大举进犯绥远，进一步窥视我国西北，国家民族存亡，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了。在这种情势下，无论为国家、为民族的利益着想，还是为委员长个人的威信着想，都应该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不停止内战，不举国团结一致，就谈不到抗日；不抗日，也就谈不到救亡图存。现在全国的人心，都一致要求政府抗日。若再继续‘剿共’打内战，必然丧失人心，绝对不会有好结果。请委员长三思而行。”张学良潸然泪下，说到动情处，以至泣不成声，“出于对领袖的尊崇，我仍要冒死进谏。我以为，委员长必须悬崖勒马，领导全国团结抗日，才是振兴国家唯一正确的道路，否则，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就会成为国家和民族的罪人！”张学良慷慨陈词，声泪俱下，却丝毫没能使蒋介石动心。蒋介石被气得七窍生烟，大发雷霆，“训斥”张学良年轻无知，受共产党的欺骗和麻醉，最后竟拍着桌子大声说：“即使你用手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改变”，并怒声斥责说：“你这样，我要枪毙你！”

张学良“哭谏”失败后，杨虎城又去了一趟华清池。蒋介石虽然没有像对张学良那样对杨虎城拍桌子，但措词也很严厉，表明“剿共”决心已定，决不改变。

张学良、杨虎城在劝蒋不成的情况下，认为“我们对蒋也仁至义尽了，为了国家的前途，现在只有干的一条路。”他们商定按原有防区分工：东北军负责临潼方向；十七路军负责西安城内，但行动日期还没有定下来。

12月9日,是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日。在中共西北特别支部的领导下,西安的青少年学生举行了轰轰烈烈的爱国游行请愿活动。

拂晓,天空阴云密布,寒风凛冽。西安各校的学生带着连夜赶制的纸旗、标语和传单,在校内集结。八九点钟,南院门广场上陆续聚集了一万五千多名学生,人们唱着救亡歌曲,呼喊救亡口号。在请愿代表团刚刚宣布大会开始时,传来了军警枪伤一名小学生的消息。顿时,全场群情激愤。会后列队到西北总部、省政府、西安绥靖公署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下午三四点钟,队伍又向临潼行进,向蒋介石请愿示威。张学良把学生去临潼请愿的事用电话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暴跳如雷,立即电令张学良派兵镇压,连声吼叫“要格杀勿论”。张学良怕学生吃亏,连忙乘车追赶游行队伍,劝学生回去,并说明,“否则会发生流血惨案。”学生们回答:“我们愿为救国而流血!我们愿为救国而牺牲!”一个学生大声说:“张先生,你的家乡东北已沦亡了五六年,你的祖宗坟墓还在那里,忘记了吗?现在,眼看日寇要全面进攻,你们的枪还要打自己人,是何居心?我们要同蒋介石去算帐!”说罢放声大哭,不一会儿,全场哭成了一片。青年学生们边哭边喊着“我们不愿做亡国奴,我们情愿为救国而死!”那哭声撕心裂肺,诉说着一个民族的苦难;那喊声震天动地,要卷起千层巨浪。

张学良地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掩面而泣。他激动地说:各位同胞!各位同学!我张学良是国家的军人,不是蒋某人的走狗。我的枪决不打自己人,你们的要求也就是我的要求。请相信我吧,我没有忘记家乡,也没有忘记祖宗坟墓,我不是愿意做亡国奴的人,我的最后一滴血一定要流在抗日的战场上。我不辜负你们的救国心愿,决不欺骗大家,一周内我用事实答复你们。如果逾期欺骗了大家,我张学良甘愿你们群众在任何地方把我处死。请同学们先回城去吧!”学生们见张学良如此动情,如此恳切,才折回西安,避免了一场流血事件。

当晚,张学良去见蒋介石,转达了学生的要求,随后乘机进谏。蒋介石怒气冲冲地打断了张学良的话:“你到底是学生的立场呢?还是国家大员的立场呢?告诉你,对于这些青年,除了用枪打,除了用刀杀,是没有办法对付的。”至此,张学良终于明白蒋介石无可理喻,他不想再说什么了,默默地退出了蒋介石的房间。发动事变的决心已定。

张学良已了解到8日蒋介石曾召开一次军事会议,没有邀他参加,蒋鼎文又暗示,蒋介石要他交出军权。

10日,张学良、杨虎城经过商谈,一致认为时不待人,决定当天准备好,11日夜间(实为12日清晨)行动。

看来,一场暴风雪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

六、兵谏华清池

1936年12月11日晚，杨虎城公馆新城大楼宴会厅，灯火辉煌，觥筹交错。张学良、杨虎城正在这里联合宴请南京政府军政大员和西安的各界名流。男宾客们有的西装革履，有的马褂长袍，夫人小姐们则个个珠光宝气，绫罗鲜艳。张学良、杨虎城与蒋鼎文、陈诚、卫立煌等人把酒换盏，议论风生。赴宴者谁也感觉不出异样，想象不到几个小时以后，这里将发生一场震惊世界的事变。

宴会结束后，张学良回到金家巷公馆，与他的文武亲信干部举行紧急会议，当众宣布“兵谏”计划。他激愤而严肃地对大家说：“我们东北军亡省亡家，又背了不抵抗的骂名，为全国人民所不谅解。这样的闷气，我们实在受够了。现在委员长死逼着我们东北军去打内战，不服从他的命令，他就要把我们调开消灭掉。我们真是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我们再也无路可走了！”说到这里，他看了看大家，又继续说道：“我已经和杨主任商量好，明晨5时临潼、西安一齐行动，采取非常措施，把他扣起来，请到城里，逼着他答应我们抗日！”

接着，张学良布置了具体行动计划：以105师刘多荃为临潼行动的总指挥；以105师二旅旅长唐君尧指挥一个团包围华清池，不使一个落网；以骑兵6师师长白凤翔、18团团团长刘桂五、卫队营营长孙铭九率卫队营冲入华清池，活捉蒋介石；同时电令驻兰州、洛阳的东北军部队一齐行动。

与此同时，杨虎城也在新城积极进行准备。

12月12日凌晨4时，寒气逼人，万籁俱寂。华清池五间厅内，蒋介石还在被窝内做着两个月消灭“共匪”的迷梦。砰！砰！砰！几声枪响，蒋介石一骨碌翻起身来，他以为是红军打进来了，惊惶失措，衣服也来不及穿，只披着睡袍，拖着鞋就往外跑。当他由两名贴身侍卫搀扶着翻越围墙时，心慌意乱，不慎跌下墙外的深沟，摔伤了腰，碰破了脚，鞋也丢了一只。最后由侍卫把他背到虎畔石后休息。后来，蒋介石回到南京，为了遮掩他的丑态，下令把这块石头叫做“民族复兴石”，还让人在这里修了一个亭子，叫做“民族复兴亭”。现在，人们把这个亭子改名“兵谏亭”。

孙铭九等冲进五间厅时，发现蒋介石已不见了，但蒋的衣帽还挂在衣架上，公文包、假牙也都摆在桌子上。刘多荃用电话向张学良报告说，蒋介石不见了，张学良很着急，立即要刘看看蒋的汽车还在不在。听说汽车还在，张学良估计蒋介石没有逃远，便下令搜山。

孙铭九率领卫队营在山上搜了好一阵子。此时，天边已露出晨光，山风四起，枯树野草在风中摇荡。蒋介石的一个亲信侍卫听见人声，探出头来观察，刚一露头，“砰”的一枪就被送上了西天。蒋介石见势不妙，连忙喊“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孙铭九听见喊声跑了过来，只见蒋介石身穿一件古铜色睡袍，白衬裤，光着头，赤着脚，嘴里没牙，满身是土，早没了昔日盛气凌人、耀武扬威的神气。蒋介石不知来的是什么部队，连问：“你们是哪里来的？”孙铭九答称：“奉副司令命令，请委员长进城，领导我们抗日，打回老家去。”蒋介石这才明白，搜山的是东北军，便带着发怒的口气说：“叫你们副司令来！”孙铭九说：“此地不安全，还是请委员长下山吧。”然后，几个士兵把他架下了山。到了华清池门口，蒋介石又耍赖，说要回自己的卧室去，东北军官兵坚决不依，孙铭九等人把他拖上了事先准备好的汽车。汽

车飞也似地向西安驶去，扬起一股股灰尘，一直把蒋介石押送到新城大楼。

华清池战斗，蒋介石的随从人员死亡 17 人，东北军有三四人受轻伤。

在临潼方面枪声响起之时，西安城内立即按计划行动。十七路军突然袭击，使对手猝不及防，7 点钟即顺利结束战斗，共缴获枪支 4000 多，扣留飞机 45 架，南京方面军警宪特死亡 200 多人，十七路军伤亡六七十人。南京来西安的军政大员蒋鼎文、卫立煌、陈诚、朱绍良、陈继承、陈调元、蒋作宾等全部被捕，陈诚是躲在地下室空木箱中被搜出来的。

华清池行动结束以后，张学良立即致电毛泽东、周恩来。电称：“蒋之反革命面目已毕现，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南京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并望红军全部集结于环县，以便共同行动，以防胡[宗南]北进。”其后张、杨又联名电邀中共中央派人来西安共商大计。

12 日上午，张学良、杨虎城向全国和南京政府发出通电，说明发动兵谏的意图，提出八项救国政治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通电之后，张学良又分别致电南京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和蒋介石夫人宋美龄，说明只要接受抗日要求，将保证蒋介石的安全。

张学良、杨虎城兵谏扣蒋，如同把天捅了个窟窿，西安内外正在孕育着一场新的风暴。

七、和战之争

12月12日深夜11点多钟，夜幕笼罩着南京城，市民们已经酣睡。国民党中央党部大楼却灯光通明，译电参谋们出出进进，神色匆忙，会议室里烟雾弥漫，吵吵嚷嚷。这里正在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联席会议，讨论对西安事变的处置问题。会议上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认为张、杨“劫持统帅”、“犯上作乱”、“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能过于瞻顾蒋公之安全，置国家纲纪于不顾。”另一种意见主张和平解决，认为“张、杨此举，如真只以抗日为范围，则在国策上只有时间之出入，而无性质上之桡凿”，还有“说服之余地”。如果立即进行讨伐，不但“内伐蔓延，輿情先背，而坐弱国力，益以外患，国将不国，遑论纲纪？”两派激烈争辩，互不相让，直至13日凌晨3点才作出决议：（一）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院长，何应钦负责指挥调动军队；（二）褫（ch）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国民党中央又电告在德国养病的汪精卫回国，以使国民党内有个代替蒋介石的人物。汪精卫接到电报后，先召集南京政府驻德、意大使，看看各国的态度，于22日启程回国，这样，在第一个回合的较量中，主战派占了上风。

南京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一向有野心，不仅一生反共，而且一贯亲日。蒋介石被扣西安，他认为这是抓军权继续亲日反共的大好时机。在取得调动军队大权后，他立即调兵遣将，组织东西两路集团军，准备发动对西安的进攻。1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并由南京政府发布讨伐令，同时任命刘峙为“讨逆军”东路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为西路集团军总司令。17日，中央军向华县发动进攻，飞机连续轰炸华县、三原等地，只因西安天降大雪，无法飞行，才未能轰炸。

在何应钦积极布置对西安进行讨伐的同时，孔祥熙、宋美龄、宋子文等主和派也四处奔走，开展活动。他们的口号是和平营救蒋介石。孔祥熙、宋美龄首先派与蒋介石、张学良都有私交的澳大利亚人端纳去西安探明情况。老谋深算的孔祥熙，在南京临时主政，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起了重要作用。他首先争取英、美的支持，稳定上海金融市场，从而稳定全国金融市场，安定人心，为和平解决西安创立必要的环境。其次，采取各种措施，争取和平解决事变，营救蒋介石。14日上午，孔祥熙以代行政院院长名义，在他的公馆召开了一个高级会议，许多人都表示赞成主和派的主张，何应钦等人也不好公开反对，会议便确定了和平营救蒋介石的方针。

宋美龄虽然连国民党中央委员也不是，无权参加一些高级会议，但作为蒋介石的夫人，她在对付主战派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13日，宋美龄与何应钦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何应钦说：“为维持国民政府威信，必须立即进兵讨伐并轰炸。”

宋美龄说：“你这样做，万一把委员长炸死了，中央政府由谁来领导？”

何应钦说：“这是中常委的集体决定，要迅速平定叛变，不能不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

宋美龄追问：“委员长的安全与国家存亡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国难深重的今天，没有委员长，就没有统一的政府，除委员长外，哪个可以领导全国？”

何应钦也恼了：“妇道人家就知道救丈夫，国家事不许你管！”

宋美龄大嚷：“你这样做，太辜负蒋先生了。”

这番争吵，使宋美龄看清了何应钦的别有用心，她在请端纳转交给蒋介石的亲笔信中，最后写道：“南京的情形是戏中有戏。”

宋美龄极力争取黄埔系的支持，她约集黄埔系军官和空军军官开会，告诉他们不要进攻西安，更不要轰炸西安，以保证蒋介石的安全。她还到中央军校去演讲，指出讨伐派的人是另有所谋，击中了何应钦等人的要害，使主战派的人不能不有所顾忌。

端纳来往穿梭，传递信息，使南京主和派与蒋介石互通音讯，迫使何应钦下令停止军事行动三天。19日，孔祥熙、何应钦、孙科、宋子文、宋美龄在孔祥熙公馆会商。决定：（一）准宋子文以私人资格去西安，营救蒋介石；（二）将对西安方面的停止轰炸期延长到22日。

19日中午，宋子文经洛阳飞赴西安，表明主和派终于在国民党中央内部占了上风。

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杨虎城及南京政府内部的主战派、主和派分别致电地方实力派，以期得到支持。地方实力派因各自的利害关系不同，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

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与蒋介石积怨甚深，矛盾重重。16日，李、白等16人通电全国，表示支持张学良、杨虎城。

四川的刘湘对蒋介石势力进入四川十分不满，希望“促成和平解决之办法，以保全御侮救国之实力”，赞同张、杨的抗日主张，反对武力讨伐。

绥远的傅作义与张学良关系密切，表示“我对张、杨两公此举，决心拥护到底”。24日，傅作义乘飞机去西安，准备居中调停放蒋并与张、杨商讨抗日援绥办法。因大雾途中迷路，他在河北易县迫降，后改乘火车25日赶到太原，此时，张学良已陪蒋介石回南京了。

山西的阎锡山几经风雨，处事圆滑，当张学良发专电征询他的意见时，他却提出了一堆问题。但阎锡山并不反对张、杨发动“兵谏”，只是认为时机未到，不能贸然表示明确态度。

新疆盛世才一贯反对蒋介石，事变爆发之初，准备响应张、杨。但他在新疆要靠苏联的帮助，知道苏联反对西安事变，便马上改变态度，19日发表声明称，“此次西安事变，不但与新疆毫无关系，且亦绝不赞同。”

尽管地方实力派的态度各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要求和平解决事变，一致抗日。这对南京政府主战派是一个不小的压力。

国际社会对张学良、杨虎城扣押蒋介石一事也做出了不同的反应。

英、美两国为了维护在华权益，一贯支持蒋介石和南京政府，赞同和支持宋美龄等人营救蒋介石的活动。英国汇丰银行应孔祥熙的要求，支持中国、中央、交通三家银行对黄金、外汇实行无限制兑换，以稳定上海金融市场。

苏联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但指责张、杨发动“兵谏”是受日本人煽动，利用反日口号来反对南京政府，是同汪精卫合作。当时，苏联为避免德、日两个法西斯国家夹攻，在远东推行联蒋遏日方针，它把中国抗日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蒋介石身上，因此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一切反蒋事件。

日本支持南京政府主战派，反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声称：“假如中国对日态度强硬而使蒋委员长释放，则形势必将趋于十分严重，我们绝不能把国民政府与张学良之间的任何妥协置之不理。”

各国、各种政治势力在西安事变上的态度，都在影响着事态的进展。

八、和谈与放蒋

12月15日晨，下了一夜的鹅毛大雪，使整个保安成了银白色的世界。周恩来的窑洞前，一匹匹战马迎风而立，正待出发。毛泽东紧握着周恩来的手说道：“恩来同志，全世界、全中国这个时候都瞩目着西安。西安很复杂，你们这次去，担子可不轻啊！”“上马吧，祝你们一路顺风。”张闻天、朱德、林伯渠等也一一与周恩来握手告别。朱德还把一条毛毯塞到了周恩来的马上。毛泽东等人是来为去西安共商大计的周恩来送行的。

原来，中共中央在获得西安事变的确实消息后，立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正确分析了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经过反复研究，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并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前往西安参加谈判。

17日下午5时左右，夕阳西下，一抹余辉放射出绮丽的晚霞。金家巷张公馆门前，张学良在焦灼地等待着。他已经派自己的座机去延安（在保安修建的临时机场太小，飞机无法降落，后又改在延安）迎接中共中央代表团。自扣蒋以来，张学良对如何处置蒋介石颇感棘手。他说：“抓住他（蒋）就像抓住个刺猬，拿在手里感到扎手，放在地下又怕跑了。”因此急切地盼望周恩来的到达。延安会谈，周恩来的远见卓识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曾对人说：“他来了，一切就有办法了。”当周恩来、秦邦宪等拐进小巷时，张学良大步迎上前去，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他见周恩来已剪去长须，笑着说：“那样长的美髯剪掉，太可惜了，”周恩来答：“我剪去长须，在城里就不那么惹人注意了，可以更方便地协助张将军排解繁难”。张学良与代表团成员一一握手、寒暄，随即引周恩来一行人进入客厅，以丰盛的晚宴欢迎中共代表团。

晚宴后，周恩来与张学良继续交谈。张学良首先向周恩来说明发动这次事变的原因、南京的动态和各方面的反应。他告诉周恩来说：“蒋介石最初拒绝谈任何问题，现在已允许谈抗日问题。说凡具备条件的，他可以照办”，并表明自己的观点说：“只要他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们就可以放他回去，还拥护他做全国的领袖。”

周恩来首先充分肯定了张学良的爱国热忱，接着说道：“西安事变存在着两种可能的前途。一是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使中国免于亡国之祸，这是好的前途。一是宣布他的罪状，交付人民公审，最后把他杀了，这就不仅不能停止内战，反而会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不仅不能抗日，反而会给日寇造成进一步灭亡中国的便利条件，这是坏的前途。为了争取一个好的前途，避免另一个更坏的前途，现在就必须力争说服蒋介石，使他放弃内战政策，走上一致抗日的道路。因此，我们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同意你的意见，只要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不仅可以放他回南京，而且还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这是因为蒋介石统治着中国的大部分地区，是国内最大的实力派，这样做有利于发动全国的抗日战争。同时还必须看到，西北的‘三位一体’将是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坚。”听了周恩来对事变性质、前途鞭辟入里的分析，张学良异常高兴，他觉得有共产党给他做参谋部，逼蒋抗日的目的一定能实施，几天来紧锁着的眉头也舒展了。

会谈中，周恩来、张学良进一步商定了南京主战派“讨伐”的军事部署，以及和宋子文的谈判条件。周、张的会谈进行的非常顺利，一直持续到

次日黎明。

18日上午，周恩来在张文彬的陪同下，又前往止园拜会杨虎城。

杨虎城从多年与蒋介石的接触中，认为蒋介石是个毫无信义，翻云覆雨的人，一旦放虎归山，必将遭到报复，因而主张将蒋留在西安。他认为共产党与蒋介石有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不会饶过蒋的。因此对周恩来谈的中共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感到出乎意料，但仍表示“只要副司令和中共一致，我无不乐从”，又说中共“不计前仇，真是伟大”。同时，他也坦率地提出了自己的顾虑，一是怀疑蒋是否能抗日，二是怕蒋报复。他对周恩来说：“国共两党是平等的，对蒋可战可和，而我是蒋的部下，蒋放走了，一旦翻脸，我的处境与共产党就不同了。”

周恩来对杨虎城的顾虑表示理解，耐心分析了国内人民要求抗日，英美苏支持中国抗日和蒋介石抗日则生的处境，指出蒋抗日的可能性增大了，现在就要力争他抗日。只要西北三方面加强团结，进而团结全国人民，蒋想报复也不可能。而且这次如果没有把握，也不能轻易放他走。杨虎城表示同意周恩来的分析和当前的军事部署，但怕报复的疑虑始终没有消除。

周恩来到西安后不到20小时，经过与张学良、杨虎城的分别交谈，对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取得了一致的意见，把中共的和平方针开始变为现实，充分显示了他坚定的原则性和充分的灵活性完美结合的卓越才能。

12月20日上午，宋子文由端纳陪同飞抵西安。张学良向宋子文谈了西安三方面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周恩来请人转告宋子文：这次事变中共未曾参与，对事变主张和平解决，这是中共团结抗日方针的继续，望宋认清形势，权衡利害，劝说蒋介石改变政策，为国家做出贡献；并说，“只要蒋先生抗日，共产党当全力以赴，并号召全国拥护国民政府，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宋子文对周恩来的意见大感意外，又十分赞赏。他弄清了西安三方面的态度，又看到蒋介石是安全的，决定回南京报告。

宋子文回到南京后，到处说蒋介石在西安很安全，赞美周恩来有“政治远见”，是“最了不起的人”，说：“南京有谁能承担这样的风险营救蒋介石，相反，还有人要轰炸。”这样一来，使主张讨伐的何应钦等人的气焰大为收敛。21日，孔祥熙同意宋子文、宋美龄去西安谈判。

12月22日，宋子文、宋美龄等人飞赴西安，参加谈判。飞机在洛阳机场停留时，宋美龄再三关照驻洛阳的国民党空军，“没有委员长的命令，飞机不许飞近西安。”下午3时，宋等一行飞抵西安，张学良、杨虎城亲自到机场迎接。当飞机降落时，宋美龄心情紧张，从手提包中取出一支手枪递给端纳说，如果她受到驻军的侮辱，就开枪把她打死。她带来了大批食品、用品，还给蒋带来了一副假牙。宋美龄一见张学良就说：“汉卿，希望你不要检查我的行李”，张学良答：“夫人请便，我不敢检查”，随即把他们一行人连人带行李一齐送进城，只收缴了戴笠随身携带的一支小手枪。

22日当天，宋美龄与张学良会见；

23日、24日，宋美龄与周恩来作了两次长谈；

23日下午，宋子文代表蒋方，西安方面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参加谈判；

24日上午，继续谈判。谈判的结果是：（一）由孔祥熙、宋子文组织行政院。宋负责组织使各方面满意的政府，肃清亲日派。（二）中央军全部撤离西北，宋子文、宋美龄负绝对责任。蒋鼎文即携蒋介石手令飞洛阳办理停

战撤兵的事。（三）蒋回京后释放“七君子”；西安方面可先发消息，宋子文负责办释放事宜。（四）苏维埃、红军名称照旧。宋氏兄妹担保停止剿共，由张学良负责接济红军。抗战爆发后，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五）先开国民党中央全会，开放政权，再召开各党各派救国会议，不开国民代表大会。（六）政治犯分批释放，具体办法与宋庆龄商定。（七）抗战爆发后，共产党可公开活动。（八）联俄，并与英、美、法联络。（九）蒋回京后通电自责，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十）西北军政由张、杨负责。至此，谈判结束。

已是夜深人静，寒风一阵紧似一阵地扑打着门窗。蒋介石孤坐灯下，骤变的风云使他那本应急速运转的大脑时常出现一片空白，他不知道谈判进行得怎么样了，忽见宋美龄、张学良等人进了屋，还没等他看清来人都是谁，就听见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声音说道：“蒋先生，我们十年没有见面了，你显得比以前苍老些。”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时，蒋介石是校长，周恩来是政治部主任，彼此早就熟悉。蒋介石见是周恩来，叹了口气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周恩来立即说：“只要蒋先生能改变“安内攘外”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接着又向蒋介石说明中共的抗日救国政策及张、杨发动事变的目的，明确指出，目前形势是非抗日无以图亡，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将自取灭亡。蒋介石考虑一下，表示三点：（一）停止剿共，联合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二）由二宋及张学良代表他与周解决以前商谈好的问题。（三）他回南京后，周可以直接和他谈判。

蒋介石已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条件，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在即，剩下的就是放蒋的问题了。

西安三方面，除张学良外，都主张必须有保证，才能释放蒋介石。24日晚上，张学良向王以哲等高级将领宣布，他要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并向中央请罪，恢复蒋的威信。王等劝张不要送，以免蒋改变主意。张学良一定要去送，并向王以哲等交待：“关于东北军，听命于于学忠；关于抗日联军总部之事，听命于杨虎城；有问题时多和周恩来商量。”

25日下午2点多钟，张学良打电话请杨虎城去，对杨虎城说：“夜长梦多，不知道会出什么大乱子，我今天决心亲自送蒋。假如万一我回不来，东北军今后即完全归你指挥。”并当场写了个手谕交给杨虎城。杨虎城虽不同意无保证地放蒋走，更不同意张学良自送蒋回南京，但他一向尊重张学良，只好同意张的意见。

张学良在杨虎城不赞同，周恩来不知道的情况下，于25日下午4时从西安机场起飞陪蒋介石回南京。

当周恩来听说张学良已和蒋介石一同去飞机场时，立即赶往机场，想劝张学良不必亲送，但到机场时，飞机已经起飞了。

周恩来望着渐渐远逝的飞机，长长地叹了口气。

杨虎城、刘多荃、孙铭九、赵一荻默默地伫立在寒风中，一言不发。他们在祈祷苍天，保佑张学良的平安归来。

九、背信弃义

南京鸡鸣寺宋子文公馆。这是一座二层小楼，室内幽雅别致，富丽堂皇，处处显示出主人的情趣和富有；屋外松槐参天，鸡鸣可闻，一派田园风光。可暂住在这儿的张学良却无心欣赏那中西合璧的楼宇、亦城亦乡的景致。一会儿，他就要去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法处大法庭接受“审判”了。当他接到军事法庭一位副官送来的拘押犯人的“传票”时，不禁怒火中烧，他狠狠地把传票摔在了地上。张学良已意识到，蒋介石开始变卦了，事情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简单。

26日中午，蒋介石飞返南京。第二天就公开发表了由陈布雷代拟的所谓《对张杨的训词》。这份煞费苦心杜撰出来的“训词”，掩盖了他对西安方面所做的团结御侮的承诺，把他的被释放说成是他的“伟大人格”感召的结果，标榜自己一向以“精诚团结，统一国家以救国”，指责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是“受反动派之煽惑，要负“毁坏纲纪”之责。

张学良26日一到南京，就被软禁在宋子文公馆。当天，蒋介石通过宋子文转告张学良写份请罪书。张学良立即写了请罪书给蒋介石，表示：“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乞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蒋介石将张学良的请罪书转给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及南京政府。29日，国民党中央决定将张学良交军事委员会依法“办理”，并内定组织高等军法会审，李烈钧为审判长。

12月31日上午10点，军事法庭开庭。主审李烈钧、审判官朱培德、鹿钟麟以及军法官、书记官依次坐开。张学良由宋子文陪同出庭。

李烈钧问：“你知道你犯了什么罪吗？”

张学良答：“我不知道。”

李烈钧问：“你何以竟敢出此举动？”

张学良答：“完全出自团结御侮，抗日救国的要求。”

李烈钧问：“你胁迫统帅，是受人指使呢，还是你自己策划的呢？”

张学良答：“我自己的主意。一人做事一人当，我所做的事，我自当之，我岂是任何人所能指使的吗？”接着问道：“我有一句话，请教审判长，可以吗？”

李烈钧答：“当然可以。”

张学良问：“民国二年（1913年），审判长在江西起义讨伐袁世凯，有这回事吗？”

李烈钧答：“是的。”

张学良问：“审判长在江西起义讨伐袁世凯，为的是反对袁世凯的专制与称帝，对吗？”

李烈钧答：“是的。”

张学良理直气壮地说：“我在西安的行动，为的是谏止中央的独断专行。”

张学良提到李烈钧湖口起义倒袁的经历，使李烈钧无言以对，只好强词夺理：“胡说！那袁世凯怎能与蒋委员长相提并论？”

整个审判不到20分钟，最后宣布了判决书：“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于上官为暴行胁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

1937年1月4日，南京政府颁布命令：“张学良处十年有期徒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从此，张学良便在“严加管束”的名义

下，先后被软禁于南京孔祥熙别墅、奉化溪口、安徽黄山、江西萍乡、湖南郴州、永兴、沅陵及贵州修水、桐梓、贵阳等地，1946年11月被押送台湾。1961年，蒋介石宣布恢复张学良的自由，但行动仍受约束。蒋介石死后，蒋经国继承了这份“遗产”，对张学良仍“严加管教”。直至1991年，张学良才被批准赴美探亲。1995年，张学良与夫人赵一荻移居美国。一位戎马倥偬了半生的军人，就这样在特务的监视下度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幽禁生活。这是世界罕见的幽禁，这是令人嗟叹的幽禁。

不论是审判，还是特赦，都不过是蒋介石玩弄的把戏。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背信弃义，不仅迫害张学良，而且对西安大军压境。1937年1月5日，南京政府通过“陕甘善后整理办法”，并任顾祝同为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杨虎城、于学忠撤职留任。

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倒行逆施，使西安军民群情激愤，战争一触即发。在这危急时刻，周恩来及中共中央代表团做了大量艰苦工作，一方面做好必要的军事准备，一面与南京政府重开谈判，呕心沥血，宵衣肝食，终于避免了内战的爆发。

西安事变后不久，蒋介石就逼迫杨虎城辞职出洋。1937年6月29日，杨虎城与夫人谢葆贞、儿子杨拯中离开上海，前往欧美考察。七七事变后，他两次急电蒋介石，要求回国，疆场抗敌，却没有得到答复。11月26日，杨虎城回国，抵达香港，即在国民党特务监视下，随后被囚禁于南昌，又辗转于湖南长沙、益阳、贵州息烽与四川重庆渣滓洞中美合作所等地。1949年9月6日，重庆解放前夕，蒋介石终于下了毒手，罪恶的匕首刺向了杨虎城将军和他那两个未成年的孩子。

为抗日救国，他冒死发动“兵谏”；

为抗日救国，他一路风尘赶回祖国；

然而，他却没能把最后一滴血抛洒在抗日的战场上。但是，他的“牺牲是光荣的，他的英名，将为全国人民所永远纪念。”

十、抗战爆发

尽管蒋介石对张学良进行了报复，但西安事变使他险些丢掉了性命，他不得不接受教训，不得不面对现实：他的反共内战政策必须停止，如果再继续打内战，他的统治就会垮台。迫于形势，1937年2月5日，蒋介石确定了关于时局的五项方针：“（一）对内避免内战，然一遇内乱，则不放弃戡乱安内之责任。（二）政治、军事应渐进，由近及远，预定三年至五年内为统一时间。（三）不说排日，而说抗战。（四）加强军队之训练。（五）各省物色品行方正之人才。”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讨论结束内战和国共关系问题。

为了“巩固和平”，争取民主，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了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五项要求是：（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

如果国民党能够实现上述要求，中国共产党愿意做出以下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经过激烈斗争，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终于在2月21日通过了一个实际上停止内战的决议案。这次会议表明了国民党由内战到抗日转变的开始和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9月22日，国民党公布《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和两党合作的谈话，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从此，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面旗帜下，中华儿女前赴后继，浴血奋战。滔滔江河，奔腾着复仇的巨浪，巍巍群山，回荡着杀敌的怒吼。一场伟大而神圣的民族救亡战争开始了。

如果说，中国人民的八年抗日战争是一首激昂的音乐诗篇，西安事变就是它的序曲。毛泽东同志曾经这样评价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两党实现停战以后，立即引起了国内各党各派各军各界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团结状况。”“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张学良、杨虎城为了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付出了鲜血、生命和自由。他们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历史将永远记住他们，人民将永远记住他们。

